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论丛（十三）

孫中山研究論叢

第四集



1986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

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庆祝中山大学建校六十二周年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DR. SUN YATSEN'S BIRTHDAY

AND

IN CELEBRATION OF THE 62N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目 录

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述·····	陈锡祺 (1)
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	李吉奎 (9)
孙中山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	林家有 (20)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浪潮·····	段云章 (35)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道德革命·····	吴熙钊 (51)
论孙中山的民主观·····	欧阳哲生 (61)
孙中山中西比较思想论纲·····	郑文江 (69)
论孙中山的主体性学说·····	邢益海 (80)
“取法乎上”	
——孙中山学习西方的理想与幻想·····	陈胜舜 贺跃夫 (90)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孙中山的影响·····	何 靖 (106)
试论日本近代化对孙中山的影响·····	章扬定 (118)
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 (1895——1905年)	
——《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	桑 兵 (126)
同盟会时期的孙中山与会党·····	陈剑安 (144)
孙中山与蔡元培·····	蔡建国 (157)
孙中山与谭延闿的关系述论·····	成晓军 (164)
五四运动与三民主义者·····	冯崇义 (176)
●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关系的初步建立·····	刘德喜 (200)
♥ 孙中山与国民会议运动·····	周兴梁 (213)
孙文研究的旧与新	
——读池田诚《孙文与中国革命》、横山宏章《孙中山的革命与 政治领导》·····	[日] 坂野良吉 (227)

责任编辑：许锡挥 马庆忠 陈寿英

封面设计：何世德

封面题字：廖蕴玉

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述

陈锡祺

(一)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它最集中反映孙中山所处时代的特点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属性。

在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之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对之有不少争议。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党一再更改名称和改组组织，但党内对民生主义的意见分歧一直存在。可以说，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不容易被人接受的部分。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各种场合谈到自己的主义和纲领时，对民生主义所作的宣传和解释最多。

在革命转折关头，需要开创一个新局面的时候，孙中山更加注意结合现实斗争对民生主义进行解释。国民党“一大”以后，他正是这样做的。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通过，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建立，标志着孙中山的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国民党“一大”以后，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的孙中山，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宣传、阐释自己的主义。这个时期，孙中山在讲民生主义时着重谈到一个以往很少涉及的内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底，孙中山在批示邓泽如等人的反共呈文时就说：“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¹⁾。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如何处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国民党“一大”开幕的次日，孙中山就作了《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的演讲。一九二四年八月，孙中山系统地演讲民生主义（原计划讲六次，实际只讲了四次）。孙中山在演讲中反复谈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仅在《民生主义》第一、二讲中，提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制度就有三十多处，多次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²⁾。又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并且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³⁾。在谈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时，孙中山说了不少赞扬马克思主义的话，称马克思的学说原理“全凭事实，不尚理想”，“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还说：“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⁴⁾

同时，孙中山又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既相同也有区别。他说：“我今天来分别共

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方法。”〔5〕孙中山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比共产主义内容更广泛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正确的理论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批评。

如果仅从孙中山说过的话来看，他的某些解释似乎是含糊其辞、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六十多年来一直引起争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持各种意见的人——甚至持极端相反意见的人，往往又不愿对这个问题作深入和实事求是的探讨。

早在孙中山生前，一些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代言人就因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持友好态度而别有用心地说他“赤化”。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曾说过：“有人以为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在十三年改组以前好象是改良的资本主义；而十三年改组以后又好象是改良的共产主义。到底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多一点，还是共产主义多一点呢，很难得一确切的答复。”〔6〕胡汉民本人自然不会赞成民生主义“是改良的共产主义”这种说法。但于此可见国民党内以及社会上不少人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误解。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谈到过，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一个军国主义“学者”坚决反对三民主义，其理由是“据孙文说‘民生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总之，他反对‘共产主义者’孙文”〔7〕。这也说明，孙中山去世后十几年，还有人因孙中山对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所作的解释而把他看成“共产主义者”。

有的人，因孙中山说了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话，因孙中山称民生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博大高深，便抓住一些词句加以发挥。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就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着重讲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很清楚，他这样做是为了当时国民党内反共势力的需要。胡汉民后来甚至这样说：“孙先生‘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一语不啻把马克思主义派的共产主义打到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路上去了。”〔8〕竟然认为孙中山阐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有的人不顾抗日大局，起劲地用民生主义来“批判”共产主义。站在国民党立场的民生主义研究者，极力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反对者。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弄清这样一些问题：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究竟怎样？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抱什么态度？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的本意是什么？他这样做说明了什么？

（二）

如果仅仅从学理上分析，“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个命题是不正确的。因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阶级基础、哲学基础、产生的条件和实行的方案都有很多带根本性的不同之处。本文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质上的差异不拟作详尽分析，因为已经有人这样做过了。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个革命家。他的民生主义虽然早即自成体系，但如何解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新课题。孙中山说

过，他曾写了民生主义的讲稿，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被烧毁。一九二四年讲民生主义，特别是讲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时，孙中山未必有详尽而完备的讲稿。他是一边处理党政军大事一边进行演讲的。演讲的内容虽以他多年来形成的思想为经纬，但有些却是针对现实斗争的即席发挥。他在讲《民生主义》时，正是革命力量蓬勃发展，而国民党内又风潮迭起，广州商团也正蠢蠢欲动之时，他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当然没有太多时间字斟句酌，因此，他用不甚严密的语言来表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且，“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尽管在学理上不正确或不准确，但这样的话由孙中山说出来，尤其在国共合作局面成立和发展之际，却又是合乎情理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甚至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反映。

孙中山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友好态度由来已久。孙中山创立民生主义理论时，就参照和吸收了欧美的某些社会主义学说。一九〇五年五月，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并要求接纳他的党（其时同盟会尚未成立）。在《民报》时期，一些与孙中山关系最为密切的革命党人，就在宣传民生主义的论著中提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他们的理论，所持的态度是赞许的。一九一一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在上海曾宣称“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9〕。民国初年，孙中山到处宣传民生主义，多次说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九一二年十月，他详细地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称赞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10〕。不过，当时和此后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并没有阐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只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一九一二年十月的这次演讲中，孙中山也谈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亨利乔治的学说等量齐观，但因他毕生对亨利乔治极为推崇，他这样做也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持赞赏态度的。

孙中山讲过，他的主义是不变的。其实并非如此。孙中山是个注意顺应时代潮流的人，他的思想就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不断吸收新事物、新思想而得到发展的。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造的国家，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这更增强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想得更多了。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中国青年研究社会主义的运动，孙中山表示欢迎，而且“引为同调”，认为这是“潮流所至，莫能抵御”〔11〕。在十月革命开辟的新时期，在西方无产者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逐步架设起桥梁的情况下，他终于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它获得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因此，“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绝非随便讲讲或出于一时策略，孙中山这样说是有其深厚思想基础的。

孙中山是站在自己独特的立场上去理解“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个命题的。共产主义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生产力高度发展、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在真挚地同情广大劳动人民并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孙中山看来，这与民生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他创立民生主义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

所以又认为“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双重误解，又使孙中山坚信只有他的民生主义适合世情、国情，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¹²⁾，实行最纯正的集产社会主义，才是实现中国人民历来憧憬的大同理想的唯一正确方法。他认为，他的方法与共产主义的不一样，但对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赞同的，所以，他对共产主义始终持友好态度。

也许人们会对孙中山阐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时表现的理论失误感到遗憾，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在中国共产党以前，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都对现实深切不满，并从古今中外先进人物所构思的未来美好图景中寻找理想模式和奋斗目标。但他们的思想毕竟局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因此，在终极目标上虽往往相仿佛，但所设计达到理想目标的方案却是千差万别的。加之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理解和吸收外国先进思想总是匆匆地进行的，紧迫的民族危机、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使他们难以从容地消化外来的新思想，因此，他们吸收外国新思想而形成的学说，在理论上往往不够严密，孙中山自不例外。但我们又必须看到，在孙中山的学说中，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在理论上却以“共产”为理想，在实践上坚持与共产主义者紧密合作，这就使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者当时的战斗纲领有共同一致的地方，而且，孙中山不断努力寻找和发展这种一致的地方。“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作出的结论。

民生主义虽然并不等同于共产主义，但它是与共产主义接近和友好的，因此，孙中山的另一个表述：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是好朋友，是一种既通俗又比较贴切的说法。

(三)

有的人很强调，孙中山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专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甚至主要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如说：“总理所指的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式的共产主义”⁽¹³⁾。若真的是这样，“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逻辑和词句上都不通了。显然，孙中山所说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即是他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谈“共产主义”时，确实有含混的地方，前后的概念、范畴也并不完全一致，他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¹⁴⁾我们决不会认为，孙中山所有提到共产主义的地方都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孙中山所说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内涵并非完全一致。孙中山在多数情况下是泛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孙中山的“共产主义”并没有排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甚至可以说，他的共产主义，主要考虑的还是共产党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孙中山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谈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这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造成巨大影响、引起人们注视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人们提到共产主义，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通常无须另加指明。

第二，当时，国民党内存在着部分旧国民党人怀疑、排斥共产党人的问题，孙中山讲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是个务实的革命家，他决不会

完全脱离这个关系到党内团结的重大问题，侈谈其他不相干的“共产主义”。

第三，孙中山本人也多次明确指出，他说的就是与共产党人有关的共产主义。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他说了很多话来消除“国民党的旧同志”对共产党的误会，说到“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15〕。又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16〕如果说这里的共产主义指的是无政府主义或者别的“共产主义”，岂不是说孙中山在无的放矢？如果上面的引文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晚上，孙中山在大本营召见冯自由等人，因冯自由等顽固坚持反对共产党人的立场，激起了孙中山极大的愤怒。据冯自由七月十五日给孙中山的信，孙中山当时怒斥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17〕。冯自由写这封信是想“忠告”孙中山放弃联共政策，他自不可能对着孙中山捏造孙中山的话。孙中山所说“开除”、“枪毙”云云，固然是一时激愤之词，事实上也并没有这样做。但他关于民生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三者密不可分的论点，却是极为明显的。可见，孙中山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认识和表述虽不尽正确，但他在谈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时主要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问题。对此，国民党的研究者谈得很多。这是我们研究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持友好态度，但又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孙中山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等作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胜过马克思主义，民生主义包含了共产主义。这些认识都是带有阶级偏见的。

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他视之为党的生命，他对自己和这个思想体系都充满自信。无论从当时的情势，从孙中山的经历、个性以及他长期形成的领袖地位来看，他都不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他的思想体系是唯一正确的，对所有其他思想都作了批评。孙中山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他迫切希望得到苏联援助的时候，还公开声明自己认为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比起当日中国政治舞台上常见的那些口蜜腹剑、朝三暮四、毫无原则的人物，孙中山这样做倒表现了他政治品格中值得尊重的地方。

如前所述，孙中山对马克思既有赞扬又有批评，他说过：“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18〕后半句话，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片面认识，他以为中国经济落后，阶级矛盾不尖锐，可以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孙中山有一个优点，就是总是正视现实。他主观上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实际上却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方法。众所周知，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的结果。它既体现了孙中山的思想，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孙中山不承认中国工人受中国资本家的压迫，但他又认为“我们中国工人要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19〕。而这正是中国当时阶级斗争状况的主要方面。孙中山有“中国没有大地主”的误解，但他也知道，那些所谓“小地

主”，“随时随地都是要刻薄农民”，中国农民受的苦比以前俄国农奴还厉害⁽²⁰⁾。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他更是依靠工农，反对买办、军阀与帝国主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孙中山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在阶级斗争的实际中他也采用了“马克思主义之法”。

同时，我们应看到，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他平息国民党内的反共浪潮有联系。国共合作建立之前或之后，都有一批原有的国民党人反对和破坏这个合作。他们昧于大势，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总是生怕同共产党（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的）合作会使国民党吃亏，担心国民党会变成共产党。其中一些人，则早与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关系密切。这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的“理论根据”之一，便是国民党的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能相容。孙中山是国民党最高领袖，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团结全体新老党员，他在讲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时实际上是考虑到党内各派人士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有的是孙中山多年的密友，有的和他共过患难，他不想也不能抛弃他们，所以苦口婆心地开导他们，希望他们跟上形势。他反复讲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致性，是要强调国共合作有思想基础的一致性；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为了消除部分国民党人的疑虑，出发点仍是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尽管孙中山说了一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话，但这与他同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友好态度是并不冲突的。

（四）

国民党“一大”以后，国共合作局面的发展，证实了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论点。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的友好态度，不仅见诸言论，而且体现在他的革命实践之中。

孙中山继续发展与苏俄的友好关系。在追悼列宁逝世的演说中，他盛赞俄国革命的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²¹⁾。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宣称“苏俄与我的政府间的关系十分友好，就象两兄弟间的关系”⁽²²⁾。他还指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²³⁾。在十一月北上时，他进一步说，“中国同俄国不仅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²⁴⁾。他在《致苏联遗书》中命国民党人继续与苏联提携合作。他的反帝思想和行动日益坚决，他与苏联的友好，同他对共产主义的友好态度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在实际斗争中继续接受共产党人的主张，贯彻扶助农工的政策。他曾表示“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方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²⁵⁾。虽则他仍不准准备采取俄国那种激烈手段剥夺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他支持农民的联合，为农民起来革命感到由衷的高兴，承认农民是革命基础，还赞成农民成立农团军，允许低价卖给枪枝。对工人在革命中作用，孙中山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要求工人“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²⁶⁾。他依靠工农镇压了商团叛乱。在最后，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大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规模宏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与工农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孙中山继续热情地发展与共产党人的友好合作关系。他不赞成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但又肯定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²⁷⁾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孙中山还认识到,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他还“劝告国民党内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象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²⁸⁾。他欢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和革命军队的建设工作,对共产党人委以要职,信任有加,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尊重孙中山,承认他的领袖地位,充分考虑他的意见和主张,在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他,并对他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帮助。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友好态度,国共两党在孙中山领导下有成效的合作,正是“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的生动有力的说明。

国民党“一大”以后,国民党右派分子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浪潮,企图迫使孙中山放弃联共政策,但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对态度特别顽固者还采取断然措施。今天,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孙中山批评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人的事实,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孙中山反对、排斥共产党的例子。有人说过,孙中山曾指示广州市党部委员黄季陆、孙科等“制裁”共产党,但当事人黄季陆出来说明并无其事,因为孙中山历来光明磊落,不会“表面是一套,而内心又是一套”⁽²⁹⁾。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点,成了他维护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思想武器。他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所作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宗旨就是为了团结新老党员。孙中山希望经自己解释后,“新旧同志误会、怀疑而生之暗潮,从此便可打消”⁽³⁰⁾。一九二四年三月的《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七月初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同年八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都体现了孙中山的这种努力。孙中山的努力有没有收效呢?虽然,那些反共人物的偏见不是一番开导便可以打消的,但终孙中山之世,反共的右派无法推翻国共合作的局面,相反,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这种合作稳固地向前发展。在这里,孙中山的威望起了作用,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真诚友好态度起了作用,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也是起了作用的。

毛泽东曾和史沫特莱谈到过共产党人信仰三民主义的问题:“孙中山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的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³¹⁾。这说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在当时,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但也接受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三民主义,但真诚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朋友,努力寻找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历史证明,不同的主义和信仰,只要它们真正是革命的和爱国的,总可以找到某种共同的基础。孙中山对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论述,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仍留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注:

①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01页。

- [2][30] 《国父全集》第二册,第626页。
- [3][4][5][14][15][16][18][19][20][21][23][25][26][27]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802、836、809807、830、666、835、842、908、937、606、948、911、833页。
- [6] 胡汉民:《平均地权的真义和土地法则的来源》,《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总第111页。
- [7] 狭间直树:《民生主义研究在日本——由明治时代至现代》,一九八五年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 [8] 《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总第39页。
- [9][12]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0、273页。
- [10]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08页。
- [11][12]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41、670页。
- [13] 蒋介石:《土地国有的要义》,《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台北一九八四年版,第2201页。
- [17] 《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上海《档案与历史》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 [24]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65页。
- [28] 《宋庆龄选集》,第465、466页。
- [29] 黄季陆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97页。
- [31]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第3页。

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

李吉奎

大同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同世界是两千多年来我国人民努力追求的理想社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同样向往大同之治，他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称为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

民生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早期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民国初年则补充了国家社会主义（又称为集产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到了晚年，他把民生主义发展成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孙中山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前景，反映了他希望通过实施自己的政治方案，去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

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是怎样得来的？我们通常称民生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一般是指平均地权土地纲领而言，但是经过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是否仍应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呢？孙中山设计的大同社会，首先是抓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其具体内容如何？他晚年在致力阐发三民主义内涵的时候，提出要用民生主义“替代”社会主义，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它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同思想，有哪些异同？本文拟对于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孙中山学说——三民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在辛亥革命以前，由于孙中山主要是从事反清活动，他虽然也谈到要“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1〕}，但还很少谈及建设大同社会的问题。民国成立以后，他以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只有民生主义尚待实行，因此他在许多场合提出实行民生主义，建设大同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不断地提到大同、世界大同或大同世界。例如，一九一二年元旦，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表示他的政府“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2〕}。同年四月一日，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又说：“况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势”^{〔3〕}。到他晚年，更表示相信将来世界上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4〕}。他还认为，“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5〕}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建设一个大同社会，与所谓的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相一致，进而实现全人类的大同。

那么，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据《礼记·礼运》记载，刘子曾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这段文字，往往被后人认作是孔子用来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记述，实际上，它是汉儒借孔子名义描绘的社会图景，反映了秦汉统一后地主阶级的一种小农经济的政治理想，是针对“大道既隐”后“天下为家”的现实而提出来的。这个美好社会是对往昔的“三代”政治的理想化，并成了两千多年来许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其中就包括了孙中山。

孙中山在谈到他的思想来源的时候写道：“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之固有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7〕他正是继承和吸收了中外文化中他认为有价值的学说，包括儒家的仁义、革命、大同等学说在内，在实践中加以改造，淘旧铸新，形成一种新的主义。所以，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是一种中西合璧、用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说，它既不是什么“因时”、“杂古”〔8〕，也不是什么继承孔孟“道统”〔9〕的东西。

大同思想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孙中山生平多次题写“天下为公”以赠中外友人，并亲自书写《礼运》大同篇。他把大同思想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张相结合，说“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10〕，指出革命党实行三民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

孙中山为了达到大同境界，一心一意投身于改造中国。他表示：“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11〕孙中山以改造天下为己任，在历史上寻找根据。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他在桂林会见了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据马林回忆，“孙向我说明他是怎样发展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的，‘一连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12〕很明显，在孙中山心目中，孔子是一个改革家的杰出代表，他继承的是改造中国这种思想。他当然不以继承古人的事业为满足，他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寻找同志和朋友。当他决定改组国民党的时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邓泽如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攻击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什么“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曾予以批驳。但他们并未停止破坏活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晚，孙中山把冯自由等人召至大本营，向他们郑重地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13〕，当我们看到孙中山赞美《礼运》大同篇，表示要继续改革者孔子的事业的时候，同样当他们看到坚持联俄联共不惜与一起奋斗多年的老同志分手，一再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民生主义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说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也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主义了。

（二）

列宁在谈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土地纲领的时候指出：“中国社会关系的辩

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的理论制订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纲领。”〔14〕孙中山采取平均地权，是为了解决土地涨价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为了反对土地垄断，其结果仍是发展资本主义。他反对资本垄断，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他表示“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15〕。孙中山这种社会主义纲领，是一种主观空想的东西，从学理上说，它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虽然如此，应当承认，这种主观社会主义，在当时条件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那么，重新解释后的民生主义，是否仍应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确定三民主义内涵，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16〕，在政纲中又加以具体化。如果仅从平均地权的解释看，内容并无多大变化；但由于增加了节制资本的内容，而且在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在他的讲话中又补充了许多观点，如主张均贫富、经济平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以及提出“耕者有其田”等，这时的民生主义，其内容更加丰富，孙中山所规划的中国未来的社会图景，已不是纯理想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7〕所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中，仍然表示“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8〕。民生主义由于它有具体的目标，符合革命的要求，因此重新解释后的民生主义，已不能简单地称为主观社会主义了。

当然，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当作共产主义，从理论上说是不正确的。虽然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与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政纲基本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此外，还有“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宇宙观的不同”与“革命彻底性的不同”〔19〕。由于有这些区别，所以决不能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孙中山把民生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大同主义，应当说在政治上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与那班口称“继承国父遗教”而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的先生们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

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确切地说，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从孙中山言论中也可以得到说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孙中山致函日本人养毅，函中全文引录了《礼运》大同篇，并谓“夫苏维埃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20〕翌年一月，孙中山在致旧金山市支部同志函中又说：“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21〕。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指明三民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国民党“一大”宣言即使不受破坏得以贯彻，在达到它的政纲所规定的目标后，它下一步如何走也成为问题。三民主义政纲并未提出消灭阶级与阶级压迫的任务，通过实行节制资本等政策所达到的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阶级社会，因此不能认为是大同社会。如果认为重新解释后的民生主义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话，只能说它并未改变主观社会主义本质，或者说它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孙中山不仅希望在中国建设大同社会，还要使世界进入大同之轨。为此，他批判帝国

主义宣传的“大同论”，即所谓世界主义。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宣传家曾极力鼓吹所谓世界主义，国内有些人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孙中山对此加以批驳，指出：“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22〕他还说过，“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23〕。孙中山要求中国四万万人与全世界十二亿五千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权，为此首先提倡民族主义，中国四万万人先联合起来，再去联合其他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用实现民族主义做基础去达到世界大同，这是孙中山大同思想的一个特色，也是他晚年反帝思想的精华。

（三）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他是中国近代较早提出在中国建设心性文明、物质文明的政治家。建设这两个文明，是他建设大同之治的基础。

孙中山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心性文明或道德文明，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他说：“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顾古来之研究，非可埋没。特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24〕。孙中山在实践中体会到两个文明互相促进的关系，也注意到中国近代虽然物质文明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但并非一切都不如人，还有比别人好的地方。这种两个文明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观点，是正确的，通过建设两个文明使社会向前发展，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中国人在文明方面有什么东西比欧美国家强呢？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方面，有自己的优点，要加以发扬光大。他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就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之大责任。”〔25〕在这里，孙中山把道德这种无形力量置于其应有的地位，提出用固有道德做基础，建设大同之治的问题。他说的道德，包括了仁义、和平、革命、大同等思想，也包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类儒家道德观念。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孙中山提出继承、发扬这些他认为比欧美文明高尚的道德，对其中一些显然陈旧的东西并未予以批判，这不是不可理解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提倡心性文明的同时，他还多次提出发达文化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对外交往的问题。可见，孙中山在发展精神文明以作建设大同之治的设想，是比较全面的。

孙中山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的理论，最突出的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建国方

略》的撰写。《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与《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部分组成。实际上，它分为上层建筑建设（心理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基础建设（物质建设）两个方面。这是孙中山生平最重要的理论著述。他表示：“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26〕这个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提出用外国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敏锐的历史眼光，是提不出来的。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如前所述，是指国家资本主义，即他的大同主义。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能力，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需要借助外力，并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孙中山在他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计划里，拟订出完整的实业计划，建设铁路、港口、城市，引进外资、科技，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福利。这些设想，在近代中国除了孙中山，还没有别的政治家提出过。孙中山还拟议兵工计划，主张化兵为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认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之一大善策。就其具体计划而言，上述设想当时并不存在实施的条件，但他决心把一个积弱已甚的中国建设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新式共和国——大同社会，两个文明一齐抓的主张，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孙中山在主张两个文明建设以达大同社会的同时，还提出人类互助，提倡博爱，主张仁道。这是作为思想家的孙中山所具有的道德观。但是，他为了达到大同世界，并不是只靠这些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他早就为中国革命制订了一个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如果没有这些具体步骤，大同社会是永远建设不起来的。

孙中山主张建设两个文明和推行革命程序，是从他的民生史观出发的。他把民生作为历史的重心，去考虑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把社会的存在与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物质生活和群众的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他不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至少公开言论是如此），他晚年也并不赞成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但他作为一个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家，能联俄联共，一致实行国民革命，“以建民国，以进大同”〔27〕，这是国内外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四）

孙中山在其论著中把民生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大同主义，但在他晚年的著作中，提法上却出现一些差异。具体说来，这就是民生主义讲演的内容不同的版本问题。

现行孙中山各种文集所收的民生主义讲演，都有如下一段话：“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包括这段话在内的三民主义十六讲的文本，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之前修订发表的。但是，对同一讲演，据说还有一个经过孙中山本人订定，生前未曾发表的本子，有些内容与公开发表的文字不同。据吴湘湘记述，孙中山逝世后，黄昌谷（原秘书）遵嘱在广州大本营孙中山寝室案头找到三民主义十六讲原稿。到了一九六五年，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将这个经孙中山手订而未刊布的本子，用红黑两色影

印,在小范围内散发,只有极少人见过。影印本红色为孙中山删改,黑色为臧正稿,书名为《国父手订本三民主义》(下文称手订本)。经查核,手订本有孙中山亲笔修改墨迹计二千八百八十三个字,为现今通行本所遗漏的计五千八百余字,相异的九千余字,以民生主义四讲为最多。吴相湘转引台湾学者张益弘的研究谓:“影印本民生主义第一讲中,孙先生对民生主义所下的定义与通行本不同,没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语句,只有民生主义就是用来替代社会主义,又是用来包括社会中一切问题的,这便是民生主义定义的范围’。这一段语句,‘替代’二字尤为重要。因其与通行本‘就是’两字意义完全不同。而且孙先生于这里连共产主义也未提及,尤可注意。”吴相湘还引录张益弘转述美国人韦登的话说:“孙先生关于此节之特别校正,显见他以为自己的理论是比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之流行学说较为进步的,而不必是(无需要)与其相同的”(28)。

由于孙中山的讲演比较真切地反映他的思想实际,同一讲演经他手订的版本文字又不尽相同,因此人们可以从中发现孙中山思想和实践中间的矛盾。对于台北发表的手订本,我们未曾看到,难于置评。台湾已出版过多种版本的孙中山全集,为什么对这个“手订本”如此保密,实在不好理解。其实,孙中山用民生主义“替代”社会主义,在通行本中已清楚地讲过,无所用其秘密。如确有这个“手订本”的话,这种版本上文字的异同,倒是有助于说明孙中山晚年思想上的矛盾。

就通行本而言,它所表达的思想也是前后不一致的。它一方面表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29)又说,民生问题的发生,是近代的事(30)。可见,孙中山是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大同主义,作为同等政治概念对待。但是,在谈到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时,他却说,“为什么不学外国直接来讲社会主义,要拿民生这个中国古名词来替代社会主义呢?这是很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研究的。”并说“我们国民党提倡民生主义已经有了二十多年,不讲社会主义,只讲民生主义”;“我们提倡民生主义二十多年,当初详细研究,反复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故采用之”;“此足见吾党之提倡民生主义正合夫进化之原理,非同时髦学者之人云亦云也”(31)。

这就是孙中山决定用民生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的理由,丝毫没有贬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意思。不过,应当指出,孙中山的叙述显然不尽符合其本人宣传社会主义的经历。早在一九〇三年,他在一次通信中就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而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32)。一九〇五年五月,他在访问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时,“首先扼要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33)。同盟会成立后,更积极宣传防止社会革命的问题,在《〈民报〉发刊词》中写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